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纪念

宁夏灵武窑

马文宽

紫禁城出版社



考古学专刊

乙种第二十六号

宁夏灵武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宁 夏 灵 武 窑

马 文 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北京故宫博物院内)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 × 1092 1/16 印张: 7.25 字数24千字 图版: 185 幅

一九八八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八八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 - 80047 - 050 - 4 / J · 28 定价: 30.00元

宁夏灵武窑

马文宽



宋代是我国制瓷业的繁荣时期，在中国瓷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宋王朝（960-1279年）先后并存的辽（916-1125年）、金（1115-1234年）和西夏（1038-1227年），因受其深刻影响，亦有较为发达的制瓷业。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辽瓷和金瓷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而对长达190年的西夏王国的瓷器面貌所知甚少，故现存的几部陶瓷史中均未论及。1983-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宁夏灵武窑进行了调查与发掘，出土了大量的西夏瓷器^①。这使陶瓷研究者对西夏瓷有一概括的认识。在发掘中还出土了一批元代瓷器，因而对此窑在元代烧制瓷器的情况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本书选录的就是这次发掘出土的部分西夏和元代瓷器。下面对灵武窑及其产品有关的部分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解放后零星发现的西夏瓷

1956年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敏盖乡发现两件黑釉剔刻花经瓶（图156、157），最初被定为元代，后又归入宋代。可见这两件经瓶为非发掘品，没有地层关系和可靠年代的实物佐证。但最后认为“可能与西夏有关”^②，应是颇有见地的。1964—1965年宁夏考古工作者在石咀山市的西夏省嵬城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了几件瓷器，有玉壶春瓶（图163）、碗、罐、人头像等^③。发掘者认为瓷人头像作秃发状，反映了西夏的社会习俗。七十年代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在银川市西郊西夏陵区发掘八号陵，出土了一些瓷器碎片^④。以后灵武县崇兴乡^⑤、甘肃武威西郊的西夏窖藏^⑥和墓葬^{⑦⑧}中出土了一些瓷器，被认为是西夏瓷。1979年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发现一处窖藏，出有3件黑釉剔刻花瓷罐（图161、162），1件白釉高圈足碗，1件白釉瓷盘等^⑨，亦应是西夏瓷。1982—1986年内蒙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发现多处窖藏，出土一批西夏瓷（图154、155、158、159、160）^{⑩⑪}。上海博物馆馆藏1件黑釉小口瓶，腹部刻有西夏文（图165）^⑫。上述零星发现多发表在七十年代末期或以后。这使人们知道了西夏瓷的存在，但囿于资料，还不足以对西夏瓷进行全面的论述。遂之，西夏瓷便成为陶瓷界所关心的重要学术课题。

窑址的调查与发掘

1983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队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海地区进行汉代烽燧遗址的调查，同时遇到几处西夏、元代遗址，采集到一些瓷片和少量较完整的器皿。这些瓷片（器）包含着著名的浙江龙泉青瓷、珍贵的江西景德镇元代青花瓷和北方名窑诸如均窑、磁州窑瓷等。但也有一些瓷器与前述诸窑的产品有别，其中胎呈浅黄色的粗瓷碗、盘较多。

这类碗、盘的特点是“挖足过肩”(即圈足的内侧深于外侧)。此外,某些大件剔刻花瓷还近似磁州窑系的产品。这些均暗示了额济纳旗附近或不太远的地方可能有窑址存在。为了探明窑址,1983年11月该队会同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对灵武县磁窑堡窑址进行了调查。

灵武县位于宁夏中部。窑址在县城东35公里处,南距磁窑堡镇(煤矿区)4公里。窑址处于沙漠之中,大河子沟河自南而北经窑址西侧蜿蜒流过。河东岸有一明代烽火台,为窑址区的最高点。窑址东侧为一干沟(季节河),干沟东有明城(旧磁窑堡城)一座,现已沦为废墟。窑址在干沟与大河子沟河之间,南北长约800米,东西宽400米左右。在此范围内各种瓷片、窑具随处可见。在干沟西侧的断崖上可看到厚达2—4米的瓷片堆积层和数座窑炉残迹。根据采集到的瓷片分析,有些瓷片具有宋代风格,推断此窑创始于西夏时期;有些瓷片则属于元代;还有少量瓷片晚至明、清时期。鉴于此窑始烧于西夏,实有发掘价值。1984—1986年间该队在此进行了三个季度的发掘。发掘坑位主要分布在遗址的中心区,即烽火台的东侧和南侧。发掘面积约700平方米。先后发掘出多处窑炉和作坊遗迹,出土了大量的瓷器、窑具等。发掘区内主要包含西夏、元代地层;至于此窑的明、清地层则集中在窑址区东北部,由于时间所限,未作重点发掘。

灵武窑的西夏瓷与元代瓷

灵武窑西夏时期的产品种类繁多,以用途分类有生活器皿、文房器具、娱乐用品、雕塑艺术品、建筑材料、兵器等;以釉色分则有白釉、青釉、黑釉、褐釉、茶叶末釉和数量较少的紫釉,还有的一器施两种釉色,如外施黑釉、内施青釉的碗等;以装饰技法分有素釉、剔釉、剔刻釉、刻化妆土、剔刻化妆土、印花、点彩和雕塑等。

生活器皿有碗、盘、盆、钵、釜、杯、高足杯、盒、壶、扁壶、瓶、罐、缸、瓮、灯、铃、钩等。每种器物又各施有不同的釉色。有些器物大小悬殊,如扁壶高11.2—35.6厘米;釜高2.3—21.8厘米之间。产品中有些较为粗糙,而各种釉色的剔、刻花瓷,白釉瓷等则制作规整、精细。现择要介绍于下。

黑釉剔刻花双耳扁壶(图26),斜唇小口、束颈、肩部两侧有系,扁圆腹。正面施釉,中间有圈足,其外刻有对称的开光,开光内剔刻折枝牡丹花,并衬以花叶,由于剔地面较大,釉与胎地的色彩对比鲜明。开光两侧刻划花叶和密集的弧线纹作为地纹,起了局部装饰的作用,由于刻划面小,釉与胎地的色彩对比比较暗,但把开光内的主题花纹衬托的更为突出。这种局部与整体的处理使画面显得疏密得当、宾主分明,颇具艺术特色。

黑釉剔刻花经瓶(图102),平折小口、束颈、宽肩、深腹修长、暗圈足。瓶体开光剔刻折枝牡丹,其造型与纹饰给人以端庄、稳重的美感。

黑釉剔刻“鹿衔花”纹经瓶(图25),形制、纹饰与上述经瓶基本相同,其开光下部剔刻一只幼鹿,口衔牡丹花,四周衬托以花叶。幼鹿作回首观望状,体态生动;使人联想到幼鹿的机警和敏捷。鹿纹早在汉代铜器上即已出现,唐代金银器上亦有之,宋代定窑、磁州窑、吉州窑瓷器上采用更多。吉州窑有幼鹿衔草纹,而此瓶剔刻幼鹿衔牡丹纹,线条简练、流畅,堪称艺术佳作。

褐釉刻花大瓶(图12),小口外卷、束颈、溜肩、长圆腹、暗圈足,通体施褐釉,仅肩部一圈无釉。腹部用刻釉技法刻划一周图案。中间一马奋蹄,鞍上立有幡旗,马前一狗似为前

导,狗左前侧有鹅一只,鹅右前方为一猛鹰在追捕一兔,惜因瓷片残缺而未能看到连续画面。此图刻划技巧虽欠熟练,但在瓷器上用刻釉技法表现出行猎的场景,尚属罕见。

白釉剔刻婴戏纹瓷片(图6),婴儿光头无眉,脸庞丰满,两眼炯炯有神,下配以尖鼻小嘴,生动地表现了婴儿的天真烂漫的情态。此画笔法洗练,颇为传神。

白釉花口瓶(图42)、五瓣花口,细长颈、圆鼓腹、喇叭形圈足。胎面施化妆土,罩以透明釉。此瓶以准确流畅的线条表现了完美的器形。

白釉三足灯(图2),直口、宽沿、浅腹下斜成平底,以三只矮足支撑。灯体以多层次的线条来构成完美的造型。腹壁上部釉色白中略闪黄,下施褐釉也颇为和谐。宋代素釉瓷器素以造型和釉色取胜,这件白釉灯,以及白釉大罐(图47),黑釉葫芦瓶(图108),茶叶末釉双耳小扁壶(图29)等都程度不同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青釉梅花点碗(图8),撇沿、曲腹、圈足。通体施青釉,内壁饰褐釉五点梅花六朵,底饰一朵。以点彩为饰多见于碗、盘、盆之上,常为五点、六点、七点组成的梅花点纹,也有少数为九点组成的菱形点纹(图67)。梅花点纹是宋、金时期民间流行的一种纹饰,一说是从纺织品移植到瓷器上的,因梅花点纹为纺织品上的装饰纹样最早见于十六国时期^③。梅花点纹在元、明时期仍可见到,并流传至今,是人们喜爱的纹饰之一。

文房器具有砚台和砚滴。圆形砚台(图30),瓷质素烧,砚面上刻有桃形墨池。背面刻“黑砚台”三字。褐釉凤形倒灌砚滴(图20),凤首、翅膀为模制、下部器身轮制。注口在底部,有圆孔与器内管状芯管相连。注水时砚滴倒置,由底孔灌注沿芯管流入腹内,使用时水从凤咀流出。因器内有管芯,立置时水不会从底孔漏出。这种倒灌砚滴、壶在宋、金时期北方许多瓷窑均有生产,如辽宁阜新曾出土金代白釉黑花菱形点纹倒灌壶^④,宋代耀州窑也曾烧造过青釉倒灌壶^⑤。

雕塑艺术品有人物和动物两种。青褐釉供养人像(图11),秃发、宽额、高鼻、双目紧闭,两腿屈跪,手捧献物。头部施褐釉,余施青釉。男性头像多为秃发,女人头像的发式很有特点,是研究西夏妇女发式的参考资料。褐釉骆驼(图21),呈卧姿,首颈仰首,两峰突起,两眼凝视前方,形象地表现了骆驼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恬静、安祥的性格。

娱乐用品仅发现瓷埙和棋子。瓷埙(图31)为素烧,形似牛首,又称牛头埙,正面有两孔,上面中间有一孔,吹之发声。这种形制的瓷埙现仍在宁夏地区民间流行,以陶为之,俗称泥娃吾。素烧瓷棋子(图120),发现数百枚,多为扁圆形,极少数为弧面形,黑、白两色,当为围棋子。少数棋子上刻有天干、地支,如丙、己、庚、寅等字。此为何棋子?如何使用?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建筑材料有瓦当、滴水、板瓦、筒瓦、瓦件、白瓷瓦等。瓦当多为兽面纹(图33),滴水饰莲花、莲叶、茨菇等水生植物(图32)。瓷筒瓦(图121)、瓷板瓦(图122)等均制作规整。上述建材均为素烧,从雕塑模制精细,尺寸较大分析,非一般民居用材。黑釉瓷瓦件(图117),仅一侧施釉,上面中间有沟槽。这种瓦件亦见于银川缸瓷井西夏砖瓦窑址^⑥,在西夏陵区也有大量发现^⑦。至于它的使用方法所施建筑部位尚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来说明。白釉瓷瓦(图71),上下等宽、弧度较小、凸面施釉、规格多种,最窄者仅宽4.2厘米。这种瓷瓦为其它窑址所少见,仅在西夏陵区有所发现。白瓷瓦系暂定名,从其形状、施釉部位和尺寸看,或可用作建筑上的贴面。

元代时灵武窑的生产规模仍然很大,这从窑址元代的地层面积和厚度得到了证实。遗址

最高处主要是西夏地层，中部以下至断崖处普遍有元代地层。以9号探方为例，元代层厚达2米，几乎与下面所压的西夏层厚度相当。但从产品质量看则不如西夏时期的精致，有下降趋势。首先，瓷的种类、器形品种均有所减少，精致的白釉瓷、瓷质建筑材料已不见。其次，胎质亦较粗厚，且以大量生产民间普通用瓷为主。第三，元代剔刻花瓷虽仍占有一定比例，但风格有了很大变化，花纹由精致变为粗放简单，前期的主题纹饰与地纹相结合的图案渐变为以带状纹饰为主的图案。元代灵武窑产品质量的下降应与此窑生产性质发生变化及时代变迁有关。现择要介绍如下。

褐釉剔刻花玉壶春瓶（图34），喇叭口、细颈、长圆腹、圈足。肩、腹部分别剔刻串枝牡丹花、波浪卷叶纹各一周。此外，亦有素面者（图126）。此时玉壶春瓶的形制已由早期的最大腹径靠近足部上提至中部。

褐釉剔刻花经瓶（图130），双棱小口，溜肩、深腹下收，近足部外撇。肩、腹部各剔刻串枝牡丹花一周，中间由带状纹和弦纹隔开。也有些经瓶上的两带花纹仅以弦纹分隔（图35），或只有一带花纹（图127），或只以几道弦纹为饰（图128）。

褐釉剔刻花双耳大罐（图36），直口、短颈、溜肩、鼓腹下收、暗圈足、颈肩部有双耳。肩和下腹部各剔刻带状波浪卷叶纹一周，腹部剔刻串枝牡丹花一周。另有仅剔刻一或二带花纹者。这种罐上有盖（图37），少数无双耳（图132、133）。

褐釉油滴单耳罐（图40），喇叭小口、束颈、深腹、圈足、颈肩部有一柄。罐体施半截釉，肩部有窑变浅黄色油滴和浅青色兔毫，釉色颇为典雅。

褐釉剔刻花大钵（图136），口微敛、斜唇有棱、腹部斜弧、圈足较深有双棱。外腹壁剔刻波浪卷叶纹。也见有剔刻串枝牡丹花纹（图39）或两带卷叶花纹的（135）。

灵武窑瓷的特点

综前所述，灵武窑生产瓷器品种繁多、器形多样，这一特点与北方很多窑址相同。但灵武窑较为显著，凡是日常生活用具中能用瓷生产的均有其产品。其原因可能与西夏境内缺乏金属矿藏有关。这一地区仅有少量的铁矿，而铜、锡矿藏极少，因此，西夏王国不得不经常向宋、辽、金三国换取。而这三国又常以此对其进行封锁。因而西夏本土所产及通过各种渠道来源的少量金属，只能提供皇室及社会上所必需的金属制品、战争所需兵器及少量用于铸造钱币（西夏王国境内大量使用的是宋代钱币及少量金代钱币）的需要。所以，尽管西夏王国有着高度发达的冶金制造业，而日常民用所需的一些金属制品不得不用瓷器来代替。

灵武窑生产的瓷器部分反映了西夏王国居民的生活与习俗。西夏王国是以党项羌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封建割据国家。党项族的经济生活历来以畜牧业为主，这在本窑产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以瓷扁壶为例，大者正反两面中间均有一圈足，反面圈足起放置平稳的作用，正面的圈足则起对称和加固胎体的作用。壶的两侧有两耳或四系便于穿绳携带。小扁壶胎体较轻，仅背面有一凹足，两侧只有双耳。这类大小扁壶在本窑中生产数量很大，为西夏境外的其它窑址所不见。这是因为这种器形适合游牧民族的使用特点。其它如牛头瓷埙是游牧民族喜爱的乐器；瓷铃（图97）、瓷钩（图98）是游牧民族常用的用具；瓷骆驼、马、羊等雕塑品则反映了这些动物与游牧民族的生活息息相关。有些男性供养人塑像的发式作秃发状，证实了西夏第一代皇帝李元昊为推行党项族传统发式所下“秃发令”的规定^⑧，在西夏王国各

代都在严格执行。

西夏王国的统治者和居民崇尚佛教。这在瓷器中也有所反映。众多的瓷供养人形象地刻画了佛教徒的虔诚神态。此外，瓷透雕宝杵、法轮、佛花等也说明了佛教密宗在西夏王国广为传播。发掘品中还有一瓷盘（图142），所刻梵文（悉昙字）排列为中台八叶院式，其含义似为归命、供养军荼利明王，又说明佛教密宗金刚界曾在这一地区盛行。

西夏王国的统治者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大量修建宫殿、离宫别馆，并建造了庞大的陵园，同时，为了利用宗教加强统治又修建了众多的寺院。这些都需要数量很大的建筑材料。从前面所述建材来看，可以推断当时西夏王国的皇宫等建筑规模是颇为壮观的。

灵武窑所产的白瓷数量很大，质量较高，加之西夏陵区曾出土的一批瓷器中白瓷占有很大比例，并且出有白瓷瓦等^⑨，这些情况的出现可能与西夏王国崇尚白色有关。

上述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器物是研究西夏王国物质文化及其历史的宝贵实物资料。

灵武窑在西夏时期生产规模庞大，产品有粗细之别。其中有些精品如高质量的白瓷、剔刻花瓷、建筑材料等显然是为官府生产。西夏王国的手工业由政府管理，早在李元昊时期政府机构中就设有“文思院”，仁宗李仁孝时期制定的《天盛年改定新律》第十章《司次行文门》规定中，政府为加强对手工业的管理，设立了多层次的管理机构，如三品中有“工技院”；四品中有“三边工院”；五品中有“铁工院、木工院、造纸院、砖瓦院”^⑩。但这些政府机构采用什么方法管理手工业，目前还缺少足够的资料说明。由于西夏是由党项羌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封建割据国家，有着很大的特殊性。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此窑冠以“官窑”或“民窑”。目前只能说，灵武窑部分产品是为官府生产，但大量较粗的器皿是为民用生产。到元代及以后，此窑主要生产民用瓷。

灵武窑的装饰技法

灵武窑瓷的胎质多呈浅黄色，这对烧制白瓷极为不利。因此，上釉前需要先对胎体进行处理。即先将一种浆料（俗称化妆土）涂在胎体上，使其遮住胎体的颜色，待浆料干燥后再罩以透明釉，入窑烧造即成白瓷。这种施化妆土的技法早在西晋时浙江婺州窑已经采用。唐代以来的邢窑、定窑、磁州窑等所生产的白瓷都使用过这种技法，可以说在瓷器上施化妆土的技法虽肇始于南方，但在北方得到了普遍的推广。灵武窑使用白色化妆土的技法显然是受到定窑和磁州窑两窑系的影响，而西夏王国崇尚白色更使得灵武窑的白瓷得到了突出的发展，温暖的釉色、端庄优美的器形体现出了白瓷的艺术魅力，给人以美的享受。有些白釉盆，碗上还施以几组稀疏的褐色点彩使器物更具备了恬静的性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剔刻花瓷可分为刻釉、剔刻釉、刻化妆土和剔刻化妆土四种。刻釉和剔刻釉均先在器物胎体上施釉，待其稍干后，前者是在釉上刻划纹饰，后者是剔、刻掉部分釉层而形成纹饰，无论是刻掉或剔刻掉的部分均露出胎体。剔、刻釉技法用于黑釉、褐釉和茶叶末釉的器物上，使之形成了釉色与胎地的鲜明对比，纹饰的艺术效果很强。刻化妆土和剔刻化妆土均先在胎体施化妆浆料，待其稍干后再刻掉或剔刻掉部分化妆土而形成纹饰，然后罩以透明釉。器物烧成后，剔刻掉化妆土的部分呈浅青色，余呈白色。无论是白地上显出浅青色花纹，还是在浅青色地上衬托出白色的纹饰，都有着极佳的装饰效果。剔刻釉（化妆土）的技法始于宋初，我国南北一些名窑曾采用过这种技法，而以磁州窑最为突出。灵武窑的这种装饰技法显然来

源于磁州窑系。

灵武窑的烧制工艺

灵武窑的窑炉大体与宋、金时期的窑炉近似。在窑炉和地层中发现许多煤砢、煤块，知其用煤作燃料。由于用煤作燃料，其火焰短，在窑内易形成氧化焰。氧化焰气氛烧成的白釉器物呈色白中闪黄，即牙黄色。而用柴作燃料，其火焰长，在窑内易形成还原焰。白釉器物在还原焰气氛烧成色泽为白中闪青，呈纯白或浅青色。这种呈色差别在于釉中少量的铁成分被氧化或还原所形成^①，灵武窑白釉瓷为牙黄色是用煤作燃料的结果。

灵武窑地处西北的沙漠地区，气候干燥，制坯后室外晾坯易干裂。故这道工序需在室内进行。发掘中在窑址作坊内发现有火炕设置，即用来烘干坯体，其工艺方式与中原和南方诸窑在室外晾坯有所不同。

灵武窑用匣钵装烧瓷器，匣钵可分平底筒状和开底式筒状两种。有些匣钵近底部钵壁有一周或两周圆孔，最大孔径5厘米。这种匣钵为其它窑址所少见。匣钵壁有多孔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便于排出匣钵内所烧坯体受热后放出的气体，尤其是采用室内烘坯，坯体内的水分含量较多，烧制中有大量水气需要排出，若不及时排出匣钵易炸裂，因液态水变成气态水体积扩大很多倍。二是匣钵由瓷土制成，较粘土所制匣钵粘度为小，受高温也易破裂，因匣钵在窑内所受温度高于瓷器的烧成温度。同时还可以防止匣钵自身在烧制时所放出气体而引起的烧裂。匣钵在唐代首先使用，它的出现是陶瓷史上的重要事件。首先匣钵保护了坯体，避免与明火的直接接触，使坯体受热均匀。同时也防止了灰尘及杂物落在坯体上，提高了所烧瓷器的质量。其次，匣钵可依次叠摞，提高了窑炉的装烧量。古代磁窑堡窑的制瓷匠人根据当地瓷土多的自然条件创造了器壁多孔的匣钵，从而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灵武窑的装烧方法有沙圈叠烧法、支圈正烧法、垫条扣烧法、芒口扣烧法、涩圈叠烧法、顶碗（顶盘）覆烧法等。这里仅介绍顶碗（顶盘）覆烧法。这种覆烧法使用的窑具是一个上口小、下口大的喇叭形顶碗或顶盘。碗、盘的坯体施釉后，在内底刮掉一圈釉（俗称涩圈），然后倒扣在顶碗（顶盘）上，如此依次倒扣十余件，最后罩以开底式筒状匣钵^②。由于器形的深浅不同，顶碗有高低之别，顶盘均矮于顶碗。这种覆烧法优于涩圈叠烧法。首先，叠烧法上面的坯体压力全部由下面的坯体承担，所以胎体均较厚重。而顶碗覆烧法支撑仅在圈足部，而这一部位是碗、盘最厚重的地方，只要这一部分支撑住上面坯体的压力，整个坯体越轻越好。正因为如此，这种碗、盘的胎壁较薄，器底尤薄。这就形成灵武窑碗、盘等器皿的显著特点——“挖足过肩”。其次，由于坯体的机械强度所承受压力有一定限度，故覆烧法叠摞的器物要多于叠烧法，因前者的胎体较薄。另外，本窑还有一种两器搭配的覆烧法，即在各类瓶的肩部刮去一圈釉，然后在其上倒扣一件碗、钵之类的器皿。但这种覆烧器皿较少，故此窑芒口瓷不多。覆烧法的出现使窑炉的装烧量大为提高。定窑陶工又首创了支圈覆烧法，但所烧器皿口沿无釉露胎，故称芒口瓷或涩口瓷。为了弥补芒口的缺点，便在器口上镶一金属口圈，使之光滑利用，但这样又增加了造价，仅能少量精品为之。因而，金代北方诸窑普遍使用了涩圈叠烧法。涩圈与芒口对于器物的美观与使用来说都是不足之点，但对一般民众使用的大路货来说，涩圈瓷要优于芒口瓷。灵武窑使用的顶碗覆烧法又优于涩圈叠烧法，减轻了胎体厚重的缺点，增加了装烧量，还可减少器物的变形。

灵武窑的年代

文献上记载灵武窑的资料极为稀少,仅明代弘治14年(1501年)胡汝砺撰《宁夏新志》中有极为简单的叙述:“磁窑山,州东北六十里,为陶冶之所”,“磁窑寨,城周回二百一十丈,门一。产砮炭,其上可陶。筑堡置官……此两河需磁器及炭者咸贸易焉”^②。可见在弘治时期,此窑还生产一定数量的瓷器供应两河地区,当时的磁窑堡城还是一个瓷器贸易市场。但到嘉靖19年(1540年)管律重修《宁夏新志》时,其间仅相隔40年,其所记瓷窑情况已明显不同,“磁窑寨……城周回二百一十丈,南门一。旧有守御官一员,汉中卫备御官军一百二十员名。正德初,以其非要冲之地,徒事糜费,乃撤之。今止庆府窑匠,军余四十余名,并各处陶器者十余人居焉”^③。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灵武窑已趋衰落,烧瓷工匠已寥寥无几。以后清代所修方志如《甘肃通志》、《河套志》、《大清一统志》、《灵州志迹》等均重述《宁夏新志》所撰内容,没有新的增补,故灵武窑的始烧年代及历朝烧瓷情况均无文献记载。现仅能依靠发掘的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说明窑址时代及其分期。

西夏层出土的瓷器具有宋、金时代明显特征。高圈足碗(图53—56)流行于北宋晚期到南宋。如景德镇柳家湾宋代青白瓷窑址所出Ⅰ式盏、Ⅱ式盏、注碗均为高圈足^④。斜壁碗(图72、73)是宋代的典型器物,河北定窑^⑤、四川重庆涂山宋代窑址^⑥均发现有这种碗。折腰盘(图52)流行于北宋和金代,定窑窑址有这种折腰盘^⑦,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北宋晚期的“风华”底款折腰盘与此盘相似^⑧。黑釉小杯(图115)与灵武县石坝村西夏窖藏出土的墨书西夏文银杯形制近似^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西夏窖藏亦出土过这种形制的铜杯^⑩。花口瓶(图42)亦为宋、金时期流行的器物,河南鹤壁集窑址北宋晚期层^⑪,山西寨沟宋墓^⑫、河北定县^⑬均有出土。图75瓷灯(或称薰炉)在河北^⑭、河南^⑮、山西^⑯、山东^⑰、陕西^⑱等省诸宋、金时期窑址或墓葬中均有发现。本窑出土的建材如黑釉瓷瓦件(图117)、白釉瓷瓦(图71)等在西夏陵区曾有发现。在发掘窑址时,西夏地层中还出土两片褐釉斜壁碗片,其上有墨书西夏文。综上所述,这些器物应属西夏时期,但其中少见辽瓷风格,而与金代瓷器相比则有很多共同之处。因此,灵武窑可能始烧于西夏中期。

元代层所出土的器物与西夏层所出的有明显区别,但有些器物形制存在一定的承继发展关系。如经瓶由小平口、斜唇小口发展成为双棱小口,由深腹、下收、暗圈足发展成为深腹、下收、暗圈足外撇。双棱小口虽出现在宋、金时期,但在元代继续存在,如西安北郊红庙坡元墓所出青瓷坛(即经瓶)^⑲。但足部外撇的经瓶则在元代遗址、墓葬中常见,如内蒙托克托^⑳、元集宁路^㉑、西安红庙坡^㉒出土的经瓶均有此特征。西夏层出土大量的斜壁碗、撇沿曲腹碗在元代层已基本不见,代之以敞口或敛口的胎质厚重的曲腹碗。西夏层出土的折腰盘、斜曲腹盘也由敞口、浅腹、坦底盘所代替。图142浅腹盘内所刻的八瓣莲瓣纹亦为元代所常见。这些都表明了时代的变迁。综观元代层所出瓷器尚保存某些早期特点,其上限或许早到西夏至元。

灵武窑存在的条件及历史背景

灵武窑址四周均为沙漠,根据发掘情况看,在西夏、元代时期这里的自然环境与今天无

大差别。那么，为什么建窑时，要选择在—地区呢？除此地具备建窑的必要条件以外，还与它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其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

首先，窑址附近的自然条件赋予它存在的必要条件。这里地下蕴藏丰富的煤矿，而且有很长的开采历史。煤是烧造瓷器的主要燃料，至迟在宋代的北方诸窑均用煤烧制瓷器。同时地质矿物学告诉我们，凡是在煤矿露头的地方或夹层中均共生有“高岭石质泥岩”和“高岭石泥岩夹矸”。这些都是优质的制瓷原料^④。窑址旁有小河流过，解决了制瓷所必备的水源。从目前掌握的资料表明，北方诸窑址均建在煤矿附近和水源充足的地方。可以说，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其次，这里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它的存在。灵武县北距西夏王国都城仅100余里，黄河流经县的西界。秦汉以来，—地区利用黄河水灌溉农田，曾修有著名的“秦渠”、“汉延渠”、“唐徕渠”等。因而农业发达，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灵武窑虽处在沙漠之中，但它面向富饶的银川平原和广大的西北地区。因而其产品有着广阔的市场，除满足西夏统治者的需要，还可满足社会上的需求。成吉思汗灭西夏以后，—地区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仍较发达。从至元元年（1264年）开始在宁夏兴渠田之利，并派著名的水利专家郭守敬等主持这一工程，“溉田万余顷”^⑤。《元史》记载，至元三年（1266年）“浚西夏中兴汉延、唐徕等渠。凡良田为僧所据者，听蒙古人分垦……诏令西夏避乱之民还本籍”。至元七年（1270年）“诏谕西夏提刑安察司管民官，禁僧徒冒据民田”。至元十八年（1281年）“河西置织毛段匠提举司”（元代称宁夏为河西）。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中兴路为宁夏府路”，“置宁夏总管府”^⑥。这些说明元代统治者对宁夏地区是比较重视的。就在这一时期世界四大旅行家之一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来到宁夏，他盛赞这里制造的驼毛毡，认为是“世界最丽之毡”，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⑦。上述材料看出，元代的宁夏地区还是比较富庶的，因而此窑得以继续生产。

第三，古灵州是西北地区的一座历史名城和交通枢纽。古灵武在唐代属灵州，为朔方节度使治所，是唐代八个边镇节度使距首都长安最近的一个。公元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唐玄宗逃往四川，其子李亨奔往灵武，并于756年即在此称帝，是为肃宗。以后肃宗以郭子仪为灵武长史，以朔方军为主要力量平定了安史之乱，遂有唐代中兴。公元1002年西夏主李继迁攻占灵州城，1003年改称西平府，并把都城从夏州迁此。1020年继迁子李德明才把都城由此迁往兴州（今银川市）。但以后兴、灵二州为西夏王国的东、西两京。这表明灵州地区是西夏王国统治的中心地区。据考证古灵州城在今吴忠市附近，距今灵武城约30里。

自唐中叶以后，吐蕃占有秦（天水）、兰（兰州）、原（固原）、会（靖远县）四州，自此长安通往西域之两驿道皆不通。故长安至西域需绕道而行。从长安出发先西北行有两驿道通灵州，再西行越沙碛（腾格里沙漠）至凉州（武威）、经甘州（张掖）、肃州（酒泉）达西域。灵州往北可达西受降城，出高阙可至回纥，黠戛斯，是通塞北的孔道。灵州往西北越贺兰山隘道，至居延海地区，经马鬃山可达高昌。宋初王延德使高昌，从夏州出发在灵州地区渡黄河后，大致沿此路行，上述这些说明灵武自古以来便是西北地区的交通中心和枢纽^⑧。古灵州城在政治上和交通上的重要地位，为此窑生产的瓷器销售及外运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西夏王国的存在是此窑创建和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西夏王国的主体民族——党项族很早就活动在祖国的西北大地。最早记述党项族的文献是《北史·党项传》。唐朝末年党项族大首领拓跋思恭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九传至李继迁时，势力大增，四出侵掠宋朝边境，地盘不断扩大。后经其子李德明的三十年休养生息，为西夏王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德明子

李元昊为人“雄毅多大略”，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开国雄主。他在1038年称大夏皇帝，定都兴庆府（即兴州），国号大夏，宋人称其为西夏，沿袭至今。据《宋史·夏国传下》记载西夏王国的领土“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抵大漠”。这一地区包括今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西南部和青海部分地区。西夏王国前期与北宋和辽，后期与南宋和金形成两个三国鼎立的局面。西夏王国在第四代皇帝夏毅宗李乾顺和第五代皇帝夏仁宗李仁孝时期国力强盛，达到了鼎盛时期，以后逐渐衰落，1227年为成吉思汗所灭。

西夏王国屹立在祖国西北大地长达190年，但如从李继迁在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开基算起长达245年。在此期间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其能与宋、辽、金三国长期相对峙来看，国力是很强盛的，加之西夏统治者热衷于学习汉文化，又使其文化得到迅速发展。由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势必导致人们对日常生活中不可须臾即离的瓷器的需求量日益加大。另外西夏统治者在汉化的过程中对汉族统治者的腐朽生活亦尽量模仿，在其日常生活中也需要一些质量较高的瓷器，此外修建豪华的宫殿，行宫别馆、陵园、官邸宅院和寺庙也都需要大量的瓷质建筑材料。在西夏和北宋进行的榷场贸易中，北宋的瓷器是与西夏进行交换的主要商品。《宋史·食货志》记载：“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在西夏遗址中常发现有北宋瓷器证实了上述记载。但从榷场输入的北宋瓷器数量是有限的，不能满足西夏王国的社会需求。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夏王国建立和发展了制瓷手工业。

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夏毅宗谅祚曾派遣使臣向宋廷“乞国子监所印书、释氏经一藏并译僧及幞头、工人、伶官”等，宋朝皇帝只允给“国子监书及释氏经并幞头”^⑨，而对译僧、工人、伶官的请求则给予拒绝。谅祚向宋廷乞取“工人”可能包括制瓷匠人。在金灭北宋后，西夏与金保持了80年的友好关系，西夏使臣往返金廷不绝。西夏也会向金廷提出上述要求。黑城曾发现《刘知远诸宫调》，可见金诸宫调已传入西夏。同样，西夏向金廷乞取制瓷匠人，可能也会得到满足。磁窑堡窑址发掘的现有资料表明，此窑是突然兴盛起来的，没有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究其原因，可能是有大批的中原制瓷匠人移居此地，带来了先进的制瓷技术所致。从而可以看出，西夏王国与中原有着密切的技术交流和文化往来。

灵武磁窑堡窑址的发掘证实了西夏王国有着高度发达的制瓷工业，并为我国制瓷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因而灵武成为我国古代西北地区制瓷业的重点产区^⑩。可以说，在宋代瓷器生产的百花园中，它是盛开在祖国西北边陲沙漠中的一朵奇葩。

注 释

-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夏灵武县磁窑堡瓷窑址调查》,《考古》1986年1期,51—55页;《宁夏灵武县磁窑堡瓷窑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10期,905—913页。
- ②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173页。
- ③宁夏回族自治区展览馆:《宁夏石咀山市西夏城址试掘》,《考古》1981年1期,91—92页。
- ④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8期,60—70页。
- ⑤钟侃:《宁夏灵武县出土的西夏瓷器》,《文物》1986年1期,87—88页。
- ⑥钟长发:《武威出土一批西夏瓷器》,《文物》1981年9期,89—90页。
- ⑦宁笃学等:《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清理》,《考古与文物》1980年3期,63—66页。
- ⑧宁笃学:《武威西郊发现西夏墓》,《考古与文物》1984年4期,111页。
- ⑨许新国:《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发现宋代窖藏》,《文物资料丛刊》8期,1983年,131—133页。
- ⑩高毅、王志平:《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发现西夏窖藏文物》,《考古》1987年12期,1091—1096页。
- ⑪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准格尔旗发现西夏窖藏》,《文物》1987年8期,91—96页。
- ⑫上海博物馆选编:《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图六。
- 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编:《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出版社,1973年。
- ⑭辽宁省博物馆编:《中国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出版社,1983年,图192。
- ⑮陕西博物馆陈列品。
- ⑯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银川缸窑井西夏窑址》,《文物》1978年8期,85—87页。
- ⑰⑱王广华:《考古工作者揭示出西夏王陵陵邑整体布局》,《光明日报》1986年7月28日。
- ⑲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85年,2704页。
- ⑳黄振华:《西夏文字典〈文海〉,〈文海杂谈〉及其研究》,《中亚学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83年,229页。
- ㉑李国桢:《历代定窑白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3年3期,306—313页。
- ㉒参看水既生:《山西古代窑具及装烧方法的初探》,《中国古陶瓷研究》,科学出版社,1987年,334—341页。文中所述“脚钵”即本文所述之“顶碗”。
- ㉓胡汝砺撰:《弘治宁夏新志》,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台北,1968年。
- ㉔胡汝砺撰、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202页。
- ㉕江西文物工作队:《江西景德镇柳家湾古瓷窑址调查》,《考古》1984年4期,365—370页。
- ㉖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窑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8期,394—412页。
- ㉗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涂山宋代瓷窑址试掘报告》,《考古》1986年10期,894—915页。
- ㉘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窑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8期,394—412页。
- ㉙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陶瓷·定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图80。

- ③⑩董居安:《宁夏石坝发现墨书西夏文银器》,《文物》1978年12期,84—86页,图三、五。
- ③⑪许新国:《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发现宋代窖藏》,《文物资料丛刊》8期,1983年,131—133页,图四。
- ③⑫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省鹤壁集瓷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8期,1—12页。
- ③⑬代尊德:《山西太原郊区宋、金、元代砖墓》,《考古》1965年1期,25—30页。
- ③⑭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陶瓷·定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图119。
- ③⑮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陶瓷·定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图59。
- ③⑯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省鹤壁集瓷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8期,1—12页,图十一;图版貳:16、17。
- ③⑰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出土文物》,1980年,图182。
- ③⑱山东淄博陶瓷史编写组:《山东淄博市淄川区磁村古窑址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6期,46—58页,图七:8。
- ③⑲嵇振西:《耀州窑遗址陶瓷的新发现》,《考古与文物》1987年1期,26—41页,图七:2。
- ④①卢桂兰:《西安北郊红庙坡元墓出土一批文物》,《文博》1986年3期,92—94页,封三:7。
- ④②李逸友:《内蒙古托克托城的考古发现》,《文物资料丛刊》4期,1981年,210—217页,图版貳拾:3、4。
- ④③张郁:《元集宁路遗址清理记要》,《文物》1961年9期,52—57页,图5。
- ④④卢桂兰:《西安北郊红庙坡元墓出土一批文物》,《文博》1986年3期,92—94页,封三:6、7。
- ④⑤郑直等:《煤系地层中高岭石质泥岩可能用作古陶瓷原料》,见《中国的瓷器》,轻工业出版社,1983年修订版338页。
- ④⑥胡汝砺撰、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20、103页。
- ④⑦《元史》,中华书局版,卷五、110、111页、131、132页;卷十一,234页;卷十五,309页;卷六十,1451页。
- ④⑧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中华书局,1955年,上册263页。
- ④⑨参看严耕望:《唐代长安灵州道及灵州在西北交通上之地位》,《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五卷第二期,1972年12月。
- ④⑩司马光:《涑水记闻》,解梁书院本,卷九、14页。
- ④⑪灵武县除磁窑堡窑址外,还在回民巷、石沟驿发现窑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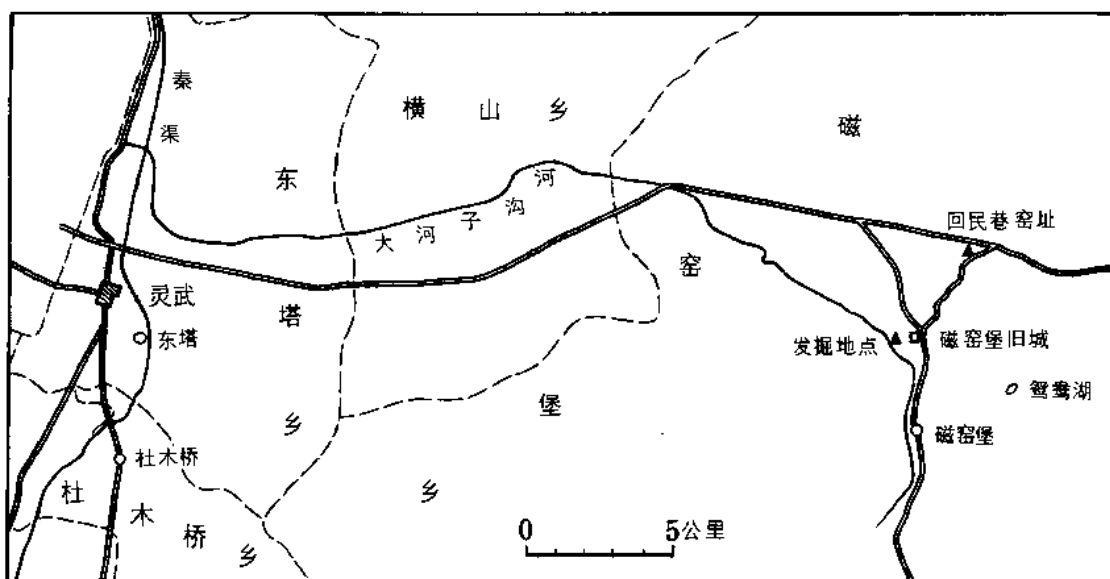
各地出土的西夏瓷器

序号	出土地点	出土时间	遗址类别	出土器物	资料来源
1	宁夏灵武县崇兴乡	1975年4月	窖藏	白釉大碗21、小碗11、盘74、高足杯（高圈足碗）6、共112件	《文物》 1986年1期
2	宁夏灵武县回民巷	1987年	窑址		待刊
3	西夏八号陵	1972— —1975年	墓葬	白瓷碟底5、白瓷高圈足碗底1、白釉瓶底1、黑釉碗底3（1件可复原）、还发现有白瓷、青瓷刻花瓷片。	《文物》 1978年8期
4	西夏陵邑	1986年	遗址		《光明日报》 1986年7月28日
5	宁夏贺兰县插旗口	1986年	窑址		待刊
6	银川西郊缸瓷井	1976年	砖瓦窑址	白瓷板瓦片 酱釉脊筒子（瓦件）等	《文物》 1978年8期
7	宁夏石嘴山省嵬城	1964— —1965年	城址	罐1、瓶1、碟4、碗5、人头像1。	《考古》 1981年1期
8	宁夏同心县	1963年发现 1984年征集		双耳白瓷罐1（内有西夏官印）	《文物》 1986年11期
9	宁夏海原县	1984年征集		剔刻花扁壶1	《宁夏文物》 1986年创刊号
10	宁夏盐池县			剔刻花经瓶1	《宁夏文物普查资料 汇编》
11	甘肃武威西郊林场	1977年	墓葬	白釉碗1 （葬于天庆七年（1200年））	《考古与文物》 1980年3期
12	武威青嘴村	1978年	窖藏	大白瓷碗22、大黑碗3、白釉高圈足碗4、白釉瓷碟5、豆绿釉瓷扁壶1、黑釉瓷罐2、平底小瓷碟7、黑釉瓷钩1，共45件	《文物》 1981年9期
13	武威西郊	1981年	墓葬	白釉高足杯1、白釉斜壁碗1、黑釉瓶1	《考古与文物》 1984年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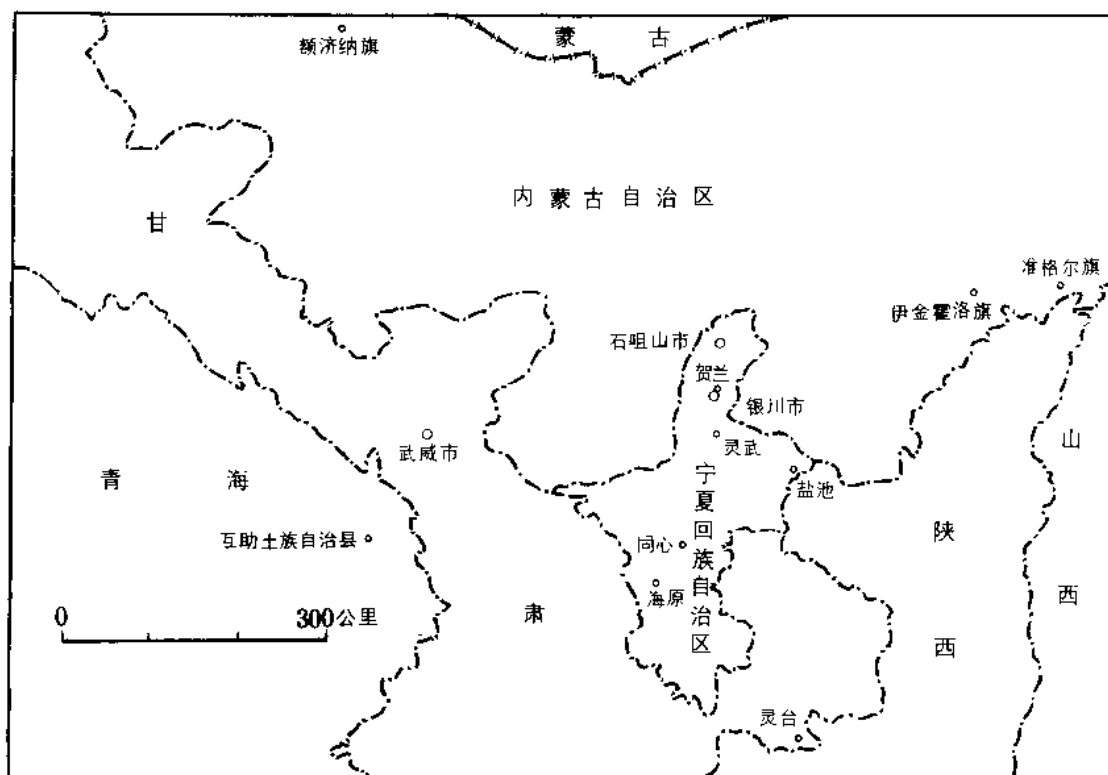
序号	出土地点	出土时间	遗址类别	出土器物	资料来源
14	武威上泉乡牌楼村			高足碗、白釉碗、褐釉扁壶	陈炳英 《西夏文物研究》 1984年
15	武威县城			高足碗、白釉碗、褐釉扁壶	陈炳英 《西夏文物研究》 1984年
16	甘肃灵台百里镇	1982年	窖藏	深褐色釉扁壶1	《考古》 1987年4期
17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敏盖村	1956年		黑釉剔刻花经瓶2	《内蒙古文物资料选集》1964年
18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 白圪针、瓦尔吐沟	1985— —1986年	窖藏	酱釉剔花瓶1、剔花罐7、 酱釉壶1、酱釉瓶1、酱釉 罐1、酱釉盆3、白瓷碗2	《考古》 1987年12期
19	内蒙准格尔旗准格尔召乡	1982年	窖藏	瓷瓮1、剔刻花口瓶1、白釉瓷 盆2、白釉瓷钵1、白釉瓷碟10、 白釉瓷碗4、白釉瓷瓶1，共20件	《文物》 1987年8期
20	内蒙额济纳旗黑城	1931年	遗址	瓷钩等物	《内蒙额济纳河地区 考古研究》1956年， 斯德哥尔摩
21	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	1979年征集	窖藏	黑釉剔花瓷坛3、白釉高圈足碗 1件、白釉瓷盘2件、白釉瓷碗 1，共十余件。	《文物资料丛刊》8期 1983年
22	传世品			黑釉小口瓶（刻有西夏文）	《上海博物馆藏瓷选》 1979年

注1. 此表所列各地出土的西夏瓷器不一定均是磁窑堡所产。因在灵武县回民巷、贺兰县插旗口亦发现有西夏窑址。

2. 宁夏固原县征集到1件黑釉剔刻花罐（图166）应是磁窑堡窑元代产品。



灵武磁窑堡窑址位置图



西北地区山土西夏瓷器地点